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

《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丛书

沈家煊 主编

语言变异与变化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主编 徐大明

《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丛书

语言变异与变化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

主 编 徐大明

副主编 蔡 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变异与变化 / 徐大明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12

(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丛书)

ISBN 7-5444-1054-4

I. 语... II. 徐... III. 社会语言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1595号

《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丛书

语言变异与变化

主 编 徐大明

副主编 蔡 冰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 200031)

各地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960 × 640 1/16 印张 28.25 插页 4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本

ISBN 7-5444-1054-4/H·0045 定价: 33.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每个时代的学术都有其自身的特色,语言学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也不例外。中国的“现代语言学”一般认为是从《马氏文通》开始的,其实除了《马氏文通》,还有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在此之前,对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通经和规范。从西方引进的现代语法学和现代音韵学从观念上不再把这些研究看作是为读经和规范服务的,而是语言科学研究的一部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学东渐成为大潮,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语言文字学(俗称小学)也和其他许多人文学科一样走向现代化。印欧语的研究传统敲开了汉语研究的“封闭”大门,要求与中国传统“结合”,《马氏文通》和《中国音韵学研究》是这一结合最重要的标志。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最主要的表现是:眼光和观念的更新,理论和方法的改进。

把语言研究视为科学研究,就是要探究人类语言的规律,大而言之,包括语言结构的规律、语言演变的规律、语言使用的规律、语言习得的规律。因为终极目标是探究人类语言的规律,不是个别语言的规律,所以注重对语言共性的挖掘。北京大学的王洪君教授从美国进修音系学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其要点就是,原来中国传统语言学(小学)在音系理论的研究方面跟西方是并驾齐驱的,但是后来落后了,差距越拉越大,落后的原因就是只立足于汉语,忽视或自动放弃对语言共性的探索。共性在个性之中,又比个性层次高,忽视和放弃语言共性的研究使我们无法与西方人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也使我们无法真正了解汉语的个性。今天有许多汉语研究者同意要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来考察,这就是眼光和观念的更新。

高本汉比较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结合韵书韵图,运用印欧语研究中卓有成效的历史比较法来研究汉语古音,开创了汉语音韵研究的一个新时期。朱德熙先生继赵元任先生之后,运用结构主义的语法理

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从形式和分布入手来划分词类,开创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影响了不止一代学人。这两个实例可以说明理论和方法的改进。

回顾历史,一百年来包括马建忠在内的先觉先悟的知识分子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纷纷从西方借鉴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用鲁迅的自白就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一百年的时间倏忽而过,中国学人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面临这样一种处境,即:西方流行的一种理论还没有很好掌握、来得及运用,人家已经换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了。中国老是在赶潮流,老是跟不上,中国学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这种处境呢?其实,科学的进步、学术的前进就是不同学术传统不断碰撞、交流和交融的结果。高本汉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得益于中国的语文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汉语音韵的研究中碰到了两次好运气:研究汉语中古音系的时候有《切韵》系统的韵书韵图,研究上古音系的时候有诗韵和汉字的谐声系列,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清代的学者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我们需要的是历史发展的眼光、科学进步的观念,加上宽广平和的心态,因为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一时的落后不等于永远落后,然而要摆脱落后,惟有先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创新。这是历史给中国学人、给中国文化留下来的唯一的再生之路。

在世界范围内,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正是本着这种学习加创新的宗旨,上海教育出版社组织推出这套《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丛书,其作者大都是一些视野开阔、在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正活跃在我国语言学界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内容多数以介绍国外近年来出现的新理论新方法为主,同时也适当包含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希望这套丛书对新时期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起到一些促进作用。

沈家煊

2006年7月

本书使用的语言学符号

⇒	最佳输出形式(优选论),见第三章第二节例(7)。
→	变化,例:stress→* sress。
ˈ	重读,例:ˈH。
—	无某项特征,例:<—cont.>。
+	有某项特征,例:<+cons.>。
*	1. 不符合规范,见第三章第三节例(38); 2. 违反制约条件(优选论),例:* H。
!	致命的违反(优选论),见第三章第二节例(7)。
()	变项,例:(o)变项。
[]	1. 音素,例:[h]; 2. 区别性特征(生成音系学),例:[+响音性]。
{ }	制约条件集合(优选论),例:{* H, * 'L}。
//	音位(音系学),例:/h/。
>>	制约条件的优先层级(优选论),例:{* H, * 'L}>>{* 'H, * L}。
C	辅音,例:CV 音节结构。
C/COMP	标句语。见第五章第五节。
F _n	频率值,见第二章第四节。
L1	第一语言。见第五章第六节。
L2	第二语言。见第五章第六节。
NP	名词短语。见第三章第三节。
∅	零形式。见第三章第三节例(30)。
V	元音,例:CV 音节结构。
VP	动词短语。见第三章第三节。

目 录

本书使用的语言学符号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语言变异: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1
第二节 什么是语言变异	2
第三节 语言变异研究的产生和发展	7
第四节 语言变异研究的理论基础	9
第五节 本书的结构和内容	13
第二章 语言变异研究方法	16
第一节 导言	16
第二节 田野调查	19
第三节 定量范式	29
第四节 实验语音学	44
第五节 文献研究法	52
第六节 语料库研究	65
第七节 语言态度研究	79
第三章 语言变异与语言结构系统	91
第一节 导言	91
第二节 音系变异	93
第三节 句法变异	108
第四节 话语变异	127
第四章 语言的社会分化	138
第一节 导言	138
第二节 言语社区	140
第三节 年龄	150
第四节 性别	160

第五节 社会阶层	169
第六节 语体	181
第七节 民族	190
第八节 家庭	202
第九节 社会网络	212
第十节 认同	226
第五章 语言变异与语言接触	239
第一节 导言	239
第二节 语言的地理扩散	241
第三节 语言接触的结果	250
第四节 言语适应与柯因内化	259
第五节 语码转换	270
第六节 语言变异与二语习得	279
第七节 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	291
第六章 语言的社会功能	300
第一节 导言	300
第二节 比较社会语言学	301
第三节 语言变异与社会类型	314
第四节 语言的生命周期	329
第七章 总结和展望	340
第一节 分析与综合	340
第二节 语言变异研究: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实践	343
第三节 理论探索:语言变异研究与言语社区理论	347
参考文献	349
附录	403
附录一:术语解释	403
附录二:人名汉英对照表	415
附录三:术语汉英对照表	426
后记	445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语言变异: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语言变异与变化(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又作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均缩略为 LVC)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语言学研究领域。有的语言学家认为它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有的则认为它就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内容(Chambers et al. 2002:1),还有的则觉得它可以与“社会语言学”等并列,作为语言学的诸研究领域之一。^①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许多大学开设的课程中,“语言变异与变化”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而在另一些学校里,“语言变异与变化”则是一门独立的课程。本书将要介绍的是从事“变异社会语言学”(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研究的学者所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达成的一些理论共识。但是,语言变异与变化又是目前语言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所以,“语言变异与变化”也可以被认为是以现象界定的一个研究领域。然而,不管是否受到以拉波夫(William Labov 1927~)为代表的变异社会语言学,或称“变异学派”(variationist school)的理论的影响和限制,对语言变异和变化的研究都不能无视本书中所要介绍的这些研究成果。

面对中文读者的关于语言变异与变化的研究成果的介绍,目前也主要集中在社会语言学的专著中。这些介绍包括综述性介绍和对一些变异学派英文专著的中文翻译。早期的翻译包括祝畹瑾编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中的几篇译文,以及从《国外语言学》杂志连载开始的特鲁吉尔(Trudgill 1983c)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的几个

① 参见美国语言学会(LSA)网页:<http://www.lsabc.org>。

译本等。综述性的介绍,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的第二到第四章基本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徐大明等在《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2004)的第三至第五章以及第六章第五节中介绍了“变异学派”和“变异理论”;在其他社会语言学家的专著中对此也有涉及,如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郭熙的《中国社会语言学》(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松岑的《语言变异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这本书专门讨论了语言变异问题,并介绍了将变异理论应用到汉语研究的成果。近年来引进的变异学派学者的英文著作也很多,在国内出版时有的带有中文“导读”,如法佐尔德(Fasold 2000)的《社会语言学》(*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有的没有,如钱伯斯和特鲁吉尔(Chambers & Trudgill 2002)的《方言学》(*Dialectology*)。

虽然国内已经有了很多关于语言变异研究的介绍,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介绍和引进得还很不够。在中国社会语言学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有很多人由于缺少比较直接的接触和阅读,对于语言变异和变化的研究成果还知之甚少,不能理解为什么国外有如此众多的学者认为它处于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地位,不了解语言变异和变化的研究有什么语言学上的普遍意义。由于较少受到语言变异理论的影响,或者对该理论存在一些误解,中国语言学界产生的有关语言变异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有较高创新程度的研究则更少。因此,我们认为对国际语言学界关于语言变异和变化的研究成果做进一步的介绍就十分必要了。

第二节 什么是语言变异

语言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变异性”。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早就指出“人人都知道语言是变异的”(Sapir 1921)。但是,在语言学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语言学家却都在回避语言变异现象,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从纷繁的语言材料中抽象出整齐划一的条条框框,因此,语言描写的成果基本排除了变异的内容。过去,变异性被认为是语言材料的一个负面的特征,语言学

理论似乎只关心脱离了变异的语言结构的规律性,近年来,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许多语言学家开始认识到,语言的变异特征也是语言的本质性特征,语言学理论必须包括对语言变异的解释。

20 世纪语言学是结构主义为主流的语言学,最主要的成果是对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认识,以及对具体语言的语音、语法、形态结构的描写和从这些对不同语言的描写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规律。在进行这些描写和分析的时候,语言学家面对一些难以处理的变异现象时,把它们视做“方言混杂”(dialect mixture)、“自由变异”(free variation),或者是方言之间的“干扰”(interference)。这些做法,都是消极地对待语言变异的做法,是把语言变异现象作为语言结构系统的例外来进行处理的做法。

“方言混杂”往往指在有方言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的语言状况,如,在城市言语社区里,由于其成员往往包括很多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个人和群体,或者在方言区交界的地方,由于许多个人和群体之间具有语言差异,从而导致了个人语言也不能保持完全一致,这些现象都被解释成为不同语言系统相互交叉的结果。但是,语言变异现象并不是只出现在人口流动和方言接触的环境中,比较稳定的言语社区中仍然充满语言变异现象。

一般认为,掌握两种方言的人在使用其中一种的时候会受到另一种的“干扰”;或者说,对第二方言的不完全的习得是由于原有方言的“干扰”。但是语言变异现象,不但不局限于方言接触的环境,也不是个别人,或者言语社区内少部分人的现象,而是任何言语社区、任何语言变体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语言表现上的偏误,还是语言习得上的缺陷都不能解释这种无所不在的普遍现象。语言变异是一种正常现象,而不是一种罕见的特殊现象。

“自由变异”是对语言结构系统中某些内容的实现形式不唯一现象的一种解释:一些在相同语言环境当中出现的两个或更多形式,如果被认为是具有相等的语义作用,它们就被认为是构成了“自由变异”。“自由变异”直截了当地称这些形式的聚合为“变异”,这成为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学说的前奏。拉波夫的纽约英语的变异研究,被称作是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对元音卷舌

特征的变异的分析;在其之前的有关研究中,美国东北部地区元音卷舌特征随机出现的现象就都一直被称为“自由变异”。“自由变异”之所谓“自由”,以该卷舌变异为例,就是其中不同的形式(卷舌的形式和不卷舌的形式)什么时候出现似乎完全不可预见。尽管如此,拉波夫(Labov 1966)及其后的许多研究者都证明,前人的所谓“自由变异”并不是原来以为的那么自由,完全没有条件制约;相反,它们受到了更多的制约,不仅语音条件和其他语言结构条件可以产生制约,语体条件、讲话人社会背景特征等许多其他条件也制约着这些貌似“自由”的变异。如果把这些有关条件的制约能力都搞清楚,对某一个变式的出现的可预见性就会大大提高。

在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研究开展之前,过去的研究一般是把语言变异看作是偶然、孤立或者是偏误性的语言内容,是特殊的外在社会环境造成的对语言结构系统的干扰。因此,在语言学理论中,语言变异是没有地位的。与此相对应的是,语言学理论包括的也只是静态、封闭的系统,由一些确定的范畴和规则所组成。然而这些一成不变的范畴和规则却与语言现实产生了很大距离,语言学理论被迫建立在忽略了语言变异的比较抽象的认识层面上。

一反过去对语言变异的消极处理做法,近年来,社会语言学家开始正面对待语言变异。首先,社会语言学家从理论上确定了语言变异不再处于边缘性的地位,一项一项的语言变异被看作是语言的结构单位。在这种理论视角下,语言变项(linguistic variable)和其他的结构单位:音素、音位、语素等一样,成为语言结构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Chambers & Trudgill 1998:128)。

作为一个结构单位,语言变项有它特定的表达方式,一般是使用圆括号来表示,用圆括号将某一个结构元素括起来,表示以该元素为代称的一个语言变项。一个语言变项总是有它特定的出现环境。所以对一个语言变项的描写,总要包括其结构环境以及其具体实现的形式。之所以成为变项,是因为它有两种以上的实现形式。这些形式就叫做“变式”(variant)。因此,“变项”和“变式”是一组概念:一个变项由一组变式构成,两个以上变式才能构成一个变项(徐大明等 2004: 100~101)。

一个常见的英语元音的变项是(u)(Chambers & Trudgill 1998: Chapt. 8)。这个变项所包含的变式至少有[u]和[ʌ]两种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变项只在某些英语方言中出现。在其他的方言中,或者是[u]和[ʌ]两个音位都出现,但不形成变项关系;或者是只出现其中一个,因此也形成不了变项。对于(u)变项的解释,结合英语语音史,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语言变化过程中的一种不稳定状况。但是对于某个具体的英语方言变体来说,这种两个变式同时使用的状况却可以是长期不变的情况。因此,怎样区分变异和变化还是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理论问题。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变化在过程中总是要体现为变异。由于确定了(u)变项,英语方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它不但建立了不同方言的音系结构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它为人们提供了描写和分析方言内部变异现象的有效手段。

下面是一个英语辅音变项的例子。这个变项出现在所有的英语方言当中。我们可以称之为“辅音丛”变项,或者就按照它的书面表示形式(CC)称之为“(CC)变项”。它的出现环境一般是音节末尾,其中第二个辅音经常不实现,例如,post 和 hand 实现为 pos' 和 han'。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在一般认为是标准的英语口语中,该变项却受到很强的条件制约。在这种口音中,后一个辅音被删除的形式基本上出现在非正式语体中,而且是出现在后面有辅音的语音环境中,如 post card 发作 pos'card, handful 发作 han'ful,等等。

然而,在英语的许多地方方言中,(CC)变项的省略变式的出现环境却超出了上述局限。在美国纽约和底特律的城市方言和英国北方的农村方言中,该省略变式的出现比例大大超过了标准英语当中该变式的出现比例,许多人谈话当中的省略变式的出现比例甚至高达 80% 以上(Chambers & Trudgill 1998:129)。然而,与标准口音一样,有后续辅音的语音环境仍然是省略的最有利条件;不同的是,地方方言的省略比例不但在相同的条件下增高了,省略的语音环境也扩展了。地方方言的省略环境同时扩展到后续音素为元音的情况,如,first answer 被发作 firs' answer, pound of tea 被发作 poun'of tea,等等。

语言变项作为一个结构单位,有它出现的特定环境。对于该变项的某一个变式的出现,如上文所示,也有其相应的环境制约条件。但

是这种制约是“变异性制约”(variable constraint), 不同于一成不变的结构条件。后者可以以英语的复辅音中爆破音失去送气的音位变体(allophone)为例。在 star、school 等词的发音中,/s/后面的/t/和/k/都实现为不送气的形式,也就是说,所有类似情况都是一样的,遇到这种环境,复辅音中的爆破音一定是以不送气的形式出现。但是变异性制约的环境限制作用却不一样,该环境只是允许有关变式的出现,而不强制其出现。如英语的(CC)变项,后续辅音的语音环境无论是在标准英语中还是在地方方言中,都允许省略的变式出现,但是并不是100%的辅音从第二个辅音都被省略,因为该变项还包含一个第二辅音不省略的变式。同时,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变式的出现比例也不同。例如,在上面介绍的英语方言当中,后续辅音和后续元音的语音环境都允许省略变式出现,但是后续辅音的环境比起后续元音的环境总是更有利于该变式的出现。后续辅音环境中省略变式出现的比例总是高于后续元音环境中省略变式出现的比例。

根据上述内容,语言变异学家一般把相对更有利某个变式出现的条件称做“强制约条件”(stronger constraint),而把相对来说不够有利的条件称做“弱制约条件”(weaker constraint)。上文提及的后续辅音环境就是(CC)变项的省略变式的强制约条件,后续元音环境就是该变式的弱制约条件。

基于语言变异现象的普遍性,对语言结构系统的比较全面的描写就应该包括语言变项的内容。对语言变项的描写则需要描写其在整个结构系统中的位置、其所包含的变式及其变式出现的各种制约条件。前面提到的只是语言结构制约条件,实际上语言变项的制约条件不仅包括语言结构条件,还包括语体和社会阶层的制约条件。从上面谈到的英语(CC)变项的内容,我们可以注意到,不同的英语变体中该变项的制约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标准英语中它只出现在非正式语体中,等等。目前已经积累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表明,语言变项不仅在方言之间、语体之间表现有所不同,在同一个方言内部,在同一个言语社区内,变项的具体实现也会有群体性的差异。其中,与语体差异相对应的一般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有关变式的出现一般是同时受到语体和社会阶层条件的双重制约。

第三节 语言变异研究的产生和发展

威廉·拉波夫一般被认为是变异学派的领袖和语言变异与变化研究的创始人。他的硕士论文《麻省马萨葡萄园岛一个音变的社会历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a Sound Change on the Island of Martha's Vineyard, Massachusetts*)和博士论文《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分层》(*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的主要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1963年和1966年,现在被认为是语言变异与变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中,前者开创了使用“显象时间”方法来进行“进行中的变化”的研究,得出了语言变化需要一定的社会动力的结论;后者一方面揭示了西方大都市环境中语言的社会层化现象,另一方面则展示了语言变异的社会层化结构与语体系统的对应关系。这几方面的内容,后来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以及不同语言的研究当中反复得到验证,目前已经被接受为变异理论和方法中的基本内容。

以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y of Montreal)等高等学府为主要基地,一大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生在以拉波夫为首的第一代变异学者的指导下被培养出来,目前这些人已经成为语言变异研究的中坚力量。从1971年乔治敦大学开始的“变异研究新方法”(New Ways of Analyzing Variation)系列学术研讨会,如今已经成为以这些学者为核心的语言变异研究者一年一度的学术论坛,目前该论坛已经召开了34届。以最近一届为例,可以说明该系列会议的一些特征:第34届“变异研究新方法”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在纽约大学召开,经过公开征稿和匿名审稿,得以在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有130篇,以贴报(poster)形式展示的有30篇。该届会议的主题为“语言变体与城市”(Lects and The City),会议通过大会发言、专题讨论、讲习班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变异研究的学术交流,并且着重讨论了多元文化的都市中所产生的语言和社会问题。第35届“变异研究新方法”学术研讨会由俄亥俄州立大学主办,于2006年11月召开,会议主题为“语言变异的跨学科的研究途径”(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Language

Variation)。

《语言变异与变化》(*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杂志的创刊可以说是语言变异研究领域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该杂志于1988年创刊,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每年出三期,迄今已经发表了几百篇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该杂志有三位主编:渥太华大学的散可夫(David Sankoff)、宾州大学的拉波夫(William Labov)和柯罗克(Anthony Kroch),他们均为著名学者。散可夫不仅是一位社会语言学家,而且是一位数学家,在计算生物学方面曾经连续获奖。由于其应用数学方面的背景以及对语言变异的深刻理解,散可夫对语言变异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使语言变异的研究走上了数学化的道路,通过概率论将语言的实际运用与语言学理论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拉波夫是语言变异研究的创始人,其核心和学术领导作用毋庸置疑。但是,他与散可夫的合作对变异学派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对语言变异研究沿着科学化的道路发展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①柯罗克是拉波夫在宾州大学语言学系的同事,曾经与拉波夫一起于2001年访华,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举办的“海外著名学者讲习班”讲学。柯罗克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仅在他的个人网页上列出的就有: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句法/语义界面研究、历史句法、自然语言的形式句法分析,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柯罗克曾经师从生成语言学创始人乔姆斯基,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过博士研究,接受过形式语言学的系统训练。因此,仅从三位主编的学术背景就可以看出一个具有广阔性、综合性特点和集语言学传统与经验科学为一体的语言学研究新导向。

《语言变异与变化》申明的办刊宗旨是发表“专门性地针对语言变异的研究”,“共时和历时语言学中系统性的、固有的语言变异的研究”,以及通过对言语实现的实际过程中的“语言结构的细节”的分析来解释“语言、文化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的研究成果”。^②上述宗旨的两个鲜明特点是:一、语言变异研究是一种研究“语言、文化、社会间的互

① 拉波夫本人曾经接受的良好硬科学的训练也会对此有一定的影响。

② 参见剑桥大学出版社(CUP)网页: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Journal?jid=LVC>。

动”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二、这种研究特别集中到了对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对象，即语言的结构和过程的研究上面。因此它明确地表明了一个对传统语言学进行补充以及与传统语言学整合的学术立场。《语言变异与变化》杂志近二十年来的成功发行表明了语言变异研究的蓬勃发展，标志着这一学科已进入一个成熟的发展阶段。其办刊宗旨也表明了语言变异研究在语言学领域中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位，并且在社会语言学领域中找到了比较确定的研究对象。

2001年由布莱克韦尔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的《语言变异与变化通览》(*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可以说是语言变异研究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这本书系多卷本“布莱克韦尔语言学通览”中的一本，由钱伯斯(J. K. Chambers)、特鲁吉尔(P. Trudgill)和希林-埃斯蒂斯(N. Schilling-Estes)三位学者编辑，收入了二十几位作者撰写的30篇文章。这部著作对40年来语言变异与变化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同时指出了变异研究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是目前所见的最新的、最全面的一本对语言变异与变化研究做综合性介绍的著作。该书选题范围广，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语言变异和变化学科所有的重大问题，目的是“让年轻学者在全面了解本学科各个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取得前人未曾取得的成就，从而推动语言变异与变化研究不断深入发展”(Chambers et al. 2002)。

语言变异与变化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逐渐走向成熟，拥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培养了一支积累了大量实证性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研究队伍。该学科正在向跨专业、跨学科、综合深入发展的研究阶段迈进。与此同时，语言变异研究对普通语言学理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这个新领域内，中国语言学界做出的贡献还比较有限。究其原因，国内学者对已有的国外成果的了解和消化不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书的目的在于提供关于该研究领域的更多的介绍和更新的观点，希望能有助于中国社会语言学学者在这方面的创新研究。

第四节 语言变异研究的理论基础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和热烈